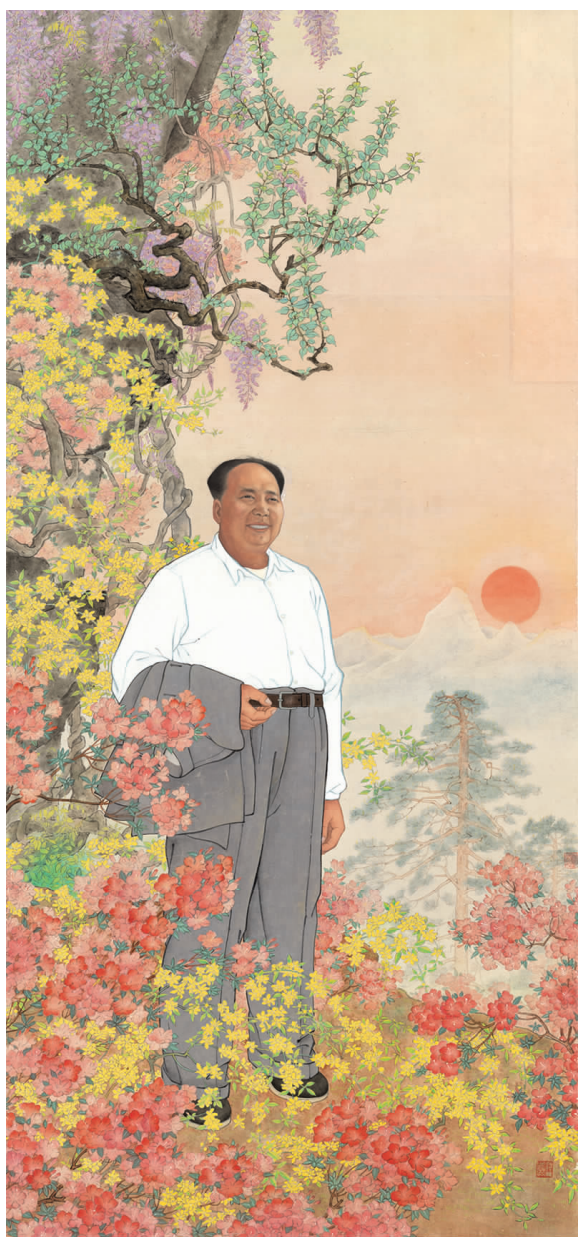


潘絮兹：“春蚕精神”的倡导和实践者

□ 邹伟平



山花烂漫



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盛唐壁画 佛说法像



敦煌莫高窟第一五九窟 梵王赴会之图

潘絮兹先生是我国现代突出的工笔重彩画家、美术理论家和编辑家，曾任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、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长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潘絮兹先生是武义县上坦人，90年代潘先生回乡省亲，应邀曾经为家乡的两位历史名人叶法善和吕祖谦画像。笔者有幸亲眼目睹了潘先生作画的情景。潘先生在铺开的宣纸面前反复思索和琢磨多时，他那凝神贯注的样子，至今仍然十分清晰可见。只见他慢慢地拿起毛笔，仔细地吮吸了墨汁，然后就非常流畅地挥洒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人物的轮廓就生动地出现在宣纸上了。然后，他要休息片刻，等待墨线干了以后再作下一步描绘。只见他又一次凝神思考起来，一边思考，还一边和当时陪在旁边的涂馆长对话。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一幅叶法善的画像就诞生了。这幅画，就被家乡的博物馆作为馆藏珍品收藏了。

令我惊奇的是，他在画人物头部发线和人物衣着动作至今还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其运笔的速度极快，手法极其娴熟，就像是纺织机的梳子一样，不断来回穿梭，游刃有余。没有多年的功夫积累，一般人很难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完全可以用“炉火纯青”来形容。

1997年，我去北京大学对外关系学院进修3个月，专程前往潘先生的四合院看望过他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潘先生，一进他的画室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“春蚕画室”的匾额，紧接着就看到那幅《春蚕吟》。不言而喻，潘先生是以“春蚕”自喻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这句诗歌的本意是消极的，可潘先生却赋予了它非常难能可贵的积极意义。潘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是一个务实的人，力戒妄念，只以春蚕精神自励。艺术如传薪，薪有熄时，火传万代。我立志为复兴工笔重彩奉献一生，愿如春蚕，吐丝至死，锦绣炳焕！有蚕之功。发扬中华民族文化，是我毕生宏愿。我的画室取名为‘春蚕’，意亦在此。”可见潘先生的良苦用心了。

潘絮兹先生生于1915年，原名昌邦，浙江武义原宣平上坦人。1932年入北京京华美术学院，师从吴光宇、徐燕孙诸书画家，专攻工笔重彩人物画。1945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，从事古代壁画的临摹研究工作一年有余。1946年得于右任先生赞助，在南京续研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；1947年曾任台湾台北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，主编《民众画报》。

1949年7月加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（即后来改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），8月始任上海（军管会）文艺处美术工厂创作编辑科长，9月加入上海美术。

1951年调北京参加筹备敦煌文物展览，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组长，1952年，加入北京中国画会，主持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临摹工作。1953年兼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《国画通讯》编辑、编委。1956年到1957年先后访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，考察文物保护和壁画修复工作；1956年开始主持山西永乐宫迁建后的壁画修复工作，1957年始任北京中国画院《中国画》编委至1960年，1960年以后曾在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、北京美术师范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河北美术学院等院校兼任工笔重彩课教学；1965年12月调入北京画院，从事专业创作，并兼任《中

国画》杂志主编。“文革”中他和所有的画家一样受到了冲击，创作活动基本停止。

1976年秋后，历史拉开了新的一页，潘絮兹先生的艺术生命也重新焕发。他特意为书房命名为“春蚕画室”。

1979年，他发起“北京工笔重彩画会”并被推任为会长；1980年，《中国画》复刊任主编，被选为中国美协北京分会副主席。此后，他曾经多次出访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国家，其代表作《石窟艺术的创造者》（1953年作）荣获1982年法国春季沙龙美展金质奖。

1987年，他任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（后改名中国工笔画学会）会长，中国画研究院进修班导师，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；1988年，首批评定为国家一级美术师；1990年，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，开始享受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；1992年，任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。

1995年潘絮兹艺术馆在家乡武义柳城落成开馆，2002年8月病逝于北京。一生定居过宣平、天水、重庆、台北、南京、金华、北京等地。

纵观潘絮兹先生的一生，生活曲折坎坷，但是他始终伴随着时代的步伐，艰难地前行。

纵观潘絮兹先生的一生，工作变化多端，但是执着于工笔重彩画艺术的志向从来没有改变。一如他自己所说的，愿如春蚕，吐丝至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够工笔画上取得了如此骄人的业绩，他才能够工笔画领域，奠定了他作为领军人物的地位。他一生辗转南北东西，数度生命危急，他不计个人得失，自觉肩负工笔重彩画复兴使命，在创作中融合传统工笔和壁画技法，吸收西画所长，形成了工整细密、设色明丽典雅的个人风貌。

潘絮兹先生的学生阿里雷公说：“从潘老的《石窟艺术的创造者》（北京中国美术馆收藏，曾获1982年法国春季沙龙金质奖）到《石窟献艺》，虽系一幅画，但从篇幅、题目和色彩及人物角色的重新安排中，可以形象地看到潘先生的艺术境界和人格升华的过程，前者作于1953年，后者作于90年代末。一繁一简，一小一大，一浓一淡，还增加了给画工送饭的家属和一位和尚。他曾对我说过：“这样表现是一环扣一环，证明不论身份是匠和商，官与民，贫与富，主与次，在佛面前，在艺术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是中国古代这些先人共同创造了这一人类的艺术宝库。”

潘絮兹先生一生开过33次以上个人画展，多次慷慨捐赠成批精品画作；坚持不懈组织中国画学会活动；孜孜培养数代青年画家；出版过敦煌学、美术史等20种专著，还发表过大量美术评论；对中国传统工笔画绘画艺术的研究、继承和复兴、发展，对敦煌学的发展，都作出了及其重要的贡献。

潘先生的学生蒋采苹回忆说：最令我难忘的是，潘老与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年的晚辈工笔画家，在三十多年里一起组织北京和全国工笔画展和学术研讨的工作。1979年潘老组织“北京工笔重彩画会”，潘老是会长，我当时是副秘书长，会员不过数十位。潘老用自己的四合院产权登记为画会会址，从此北官房17号就成了北京工笔画家的“家”，我们在自己的“家”里开会、举办学术研讨会，讨论画展，谈论工笔画发展的美



学生时代的潘絮兹（1935年）

好前景，免不了还要在潘老家吃饭。潘老的夫人张怡贞先生（中学美术老师）不但给我们张罗沏茶、倒水、做饭，还要担任画展的收件和收件以及做不完的繁琐工作，张老师才是名副其实的“秘书长”。

此后潘絮兹先生每隔一二年就主持一次工笔重彩画展，最早的一次是在颐和园举行的，其后有《红楼梦绘画作品展》、《北京湖南工笔画联展》等。当时北京市美协刘迅先生全力支持潘老的工作，不但免费提供市美协常年租用的展厅——北海公园画舫斋，他还亲自参加工笔画的学术研讨会，同时还提供研讨会的经费和出版学术论文集的经费。有了工笔画家的组织，北京工笔画队伍不断扩充，工笔画佳作也不断问世，并且在重要画展上连获大奖。

正是这种品德双高的境界，才使潘絮兹先生广泛赢得了艺术界的美誉，才使得他能团结中国工笔画界的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，历经20余年，复兴并发展了几近衰微的中国工笔重彩画，一改明清以来文人画独占画坛的历史局面。

蒋采苹说，绘画原本是画家个人的事情，画家对自己的绘画事业需要一种“春蚕精神”，像“春蚕”一样，吃的是青青的蚕叶，吐出的是极有价值的美妙丝线。对国家、对人类、对集体的事业来说，更需要一种“春蚕精神”。“春蚕精神”，我认为它主要是一种奉献精神。潘絮兹先生领导下的两个工笔画组织在20多年间筹办了近20次画展，出版了多种画集，举行了多次学术研讨会。参加筹办画展等活动的许多画家都在“春蚕精神”的感召下，无私地奉献着、为工笔画家们工作着。有人估计目前全国工笔画家有数万名。2003年11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由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主办的“微观与精致——小型工笔画展”，筹委会一致决定将所有奖项中的金奖定名为“金蚕奖”。

潘絮兹先生说：“我是一个务实的人，力戒妄念，只以春蚕精神自励。艺术如传薪，薪有熄时，火传万代。”

潘絮兹先生倡导的“春蚕精神”，如星火传薪，光大发扬。据悉，潘先生的家乡武义县政府已经启动了“潘絮兹诞辰100周年艺术系列活动”，潘先生的学生阿里雷公等工笔画艺术家已经应邀前来写生创作。笔者以为，这些活动，都将有益于工笔重彩画的复兴，有益于潘先生提出的“春蚕精神”的弘扬。



抗日战争时期在五十九军政治部 1939年



1949年在上海国画改进座谈会上



在修复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

纪念潘絮兹诞辰一百周年